

主持人语

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8.01.005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和描述由来已久。近百年来，海外汉学家的研究视域逐渐拓宽，涉及学科日渐增多。近代以来，作为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在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种重大的变化是和海外汉学有关系的。基于悠久的学术传统以及不断更迭丰富的学术理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相关问题时，往往带有与中国不同的视野、视角与观点。这些“异域的眼睛”也愈发成为中国学术界不可忽视的因素。两年前，著名汉学家孔力力的去世不仅引发了国内历史学研究者的讨论，也引发了大众和媒体的关注。

在艺术与设计学研究领域，西方学者对于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艺术的研究同样是国内关切的话题。本期《特别策划》即以“海外汉学”为焦点，试图呈现专注于此领域的汉学家在中国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方面的研究图景，通过几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呈现汉学家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以及西方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化与艺术研究的现状。为了在时间维度上使议题更加集中，几篇文章所关注的范围大体集中在 16 世纪至 20 世纪初，即中国的明清至民国时期。

安东篱、李启乐、傅凌智的三篇论文分别以清代扬州服饰、清代的西洋镜与视觉文化以及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杨家埠年画为研究

对象，安东篱的宏观研究视野与对中文材料的旁征博引令人赞叹，李启乐由西洋镜引发的对视觉文化与社会阶层的思考颇有启发性，而傅凌智对民间木版年画与现代性关系的分析为我们研究这一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裴珍妮对三部重要的中国明清艺术史研究著作的评述，让我们得以了解西方学者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方法、成果与价值。而英籍华人张弘星以英国现象级的中国绘画展为切入点，为我们带来了对于如何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研究与呈现中国艺术的思考。（赵毅平）

时尚城市？清代扬州服饰一瞥

The Fashionable City? Glimpses of Clothing in Qing Yangzhou

[澳] 安东篱 Antonia Finnane

翻译：王春霞 穆凤良 Translated by Wang Chunxia Mu Fengliang

译校：赵毅平 Corrected by Zhao Yiping

内容摘要：20 世纪 30 年代的扬州被描述为衰败的和“不摩登”的，然而它曾经在 17 世纪末具有完全不同的繁荣景象，尤以服饰的精美及时尚的快速更迭为表征。扬州的服饰与时尚在这期间究竟呈现出哪些特点？是否可以把扬州视为时尚界的早期版上海？本文通过考察与

日军入侵上海之后，在 1932 年初，江苏省教育厅从省会镇江迁往扬州。当时的新闻部主任易君左（1898—1972）在被迫逗留扬州之际写过一些随笔，留下了他对该城的印象。随笔后来作

讨论 16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初期扬州的服装生产与消费，穿着文化与生活方式，世界背景下的贸易往来与时尚交流等，勾勒出一幅清代扬州的时尚图景。

关键词：扬州、时尚、清代服饰

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8.01.006

为一本小书发行，题为《闲话扬州》。不料，由于它描写了与日本人合作的扬州男人和作为娼妓的扬州女人，引起了一些公愤。市容的描写也激怒了当地人。在易君左眼中，扬州是往日的泥潭，

肮脏、破旧，反映了国家落后的一面。^[1]

在一片停滞和衰败的景象中，该书还呈现了一位“不摩登”的女性。除了女性劳工，扬州妇女呈现出萎靡不振的状态，与文艺复兴

(risorgimento) 的时代精神相矛盾。在易君左眼中, 她们的服饰十分土气老套。老年妇女坐在大门边抽旱烟, 中年媳妇穿着老式的裤子, 一年到头扎着裤脚, 少妇花枝招展。因此他写道, 扬州女性“很少有摩登化的”。^[2]

很早以前, 另一位访客却给出十分不同的评论, 他是明朝遗民李淦(1626—?)。在17世纪90年代, 扬州人讲究新颖穿戴几近于全神贯注, 给李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禁感叹: “天下唯扬州郡邑, 服饰趋时……” 他的描述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臧获苟出富贵之门, 纨丝被体, 锦绣护脰……”^[3] 精美的服饰曾经是扬州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 在17世纪末叶引发过文人墨客的诸多评论。诗人孔尚任(1648—1718)、散文家魏禧(1624—1681)等都有诗文证明扬州在康熙盛世(1661—1722)的繁荣地位。^[4]

我们不妨设想, 此地及其居民在这么漫长的时期内已经发生了改变。17世纪末叶, 经过半个世纪的王朝更替战争, 在一片废墟上, 一个新王朝的统治者正在大力重建和扩充帝国版图。扬州在那场战争中荒芜了, 又重新经历17世纪90年代经济的强劲增长。相比之下, 到了20世纪30年代, 在国家分裂的逆境中, 扬州偏僻落后, 脱离主流, 被上海甚至镇江等动态变化的中心远远地甩在后面。就综合实力而言, 此时的中国与17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形势上没有太大的不同, 软弱的中央政权面临着经济低迷、自然灾害、内部骚乱, 还有外敌压境。

这两个时代被若干换装的(vestimentary)政权区分隔开。17世纪末, 中国人还在逐渐适应被满族征服的文化影响。男子头发要编成满族风格的辫子, 他们的长袍(如果他们属于穿长袍的阶层)要比明朝时裁剪得更加接近体形。汉族妇女明确地希望避免打扮得像满族, 而新政权为了维护稳定也在协商着文化的形式和服饰的样式。从李淦的描述来看, 统治阶级接触到了新衣料, 结果带来了丝绸产业的扩张。

到了20世纪30年代, 脑后结辫已成往事, 满族规矩也荡然无存。男士仍穿长袍, 但褶边的位置提高了。裹身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城市女性的标准服饰, 与世纪之交的任何中国服饰都截然不同。^[5] 20世纪30年代的时装虽然展示了东西方历史交织影响的印记, 错综复杂, 但很明显, “遥远的西方”(欧洲和北美)已经取代了亚洲的“中东”, 成为当代服装主流风格的外来灵感。丝袜、高跟鞋、西装领带等服饰类型在内

陆城镇还不普遍, 但是在不断变化的裁缝界已经可见。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 在前后的评论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对称性。李淦是本地人, 来自贫穷的小镇兴化, 这是扬州西北洪水易发的沼泽地带。作为明末学子, 他隐居扬州, 不愿成为清朝的官员。此地是巨商、富贾、众官择居的城市, 生活的奢华一定会让李淦感到震惊。他所提及的妻妾现象提醒了读者徽州盐商如何与纳妾现象密切相关, 他们是主宰扬州商界的精英阶层, 有一种说法便直接针对徽州盐商——“惟娶妾、宿妓、争讼, 则挥金如土”^[6]。

相比之下, 易君左生于湖南, 后移居镇江。自1928年被选作省会, 镇江经历了大都市改造。更为重要的是, 易君左还在上海生活了多年, 那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熔炉, 毋庸置疑, 也是时尚之都。上海从旧时代走出来, 与之渐行渐远; 然而, 扬州坐落于旧时代的交通枢纽(长江以北, 大运河上), 与时尚和潮流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扬州的生活节奏比较缓慢, 简直是处在另一个时区。按郁达夫所言, 扬州从中国文化生活的中心向外围迁移。他在1935年告诉林语堂: “我劝你也不必游扬, 还是在上海梦里想象欧阳公的平山堂, 王阮亭的红桥, 《桃花扇》里的史阁部, 《红楼梦》里的林如海, 以及盐商的别墅, 乡宦的妖姬, 倒来得好些。”^[7] 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城市分级中, 实际上上海取代了扬州, 正如在某些方面上海取代了苏州。^[8] 以上各种评论所隐含的视角反映了扬州当时所处的地位。

扬州与上海：引领风骚不同时？

可不可以把扬州想象为时尚界的早期版上海? 在《上海和帝国的边疆》(Shanghai and the Edges of Empires) 一书中, 孟悦认为, 上海的国际化脱胎于扬州所具有的都市化, 再辩证地发展。中国在艰难痛苦地转型, 像一头大象把重量从一侧转移到另一侧, 而扬州在此过程中已经失去它在中国的引领地位。从扬州和上海的园林艺术中, 孟悦收集了特别的证据来强调, “直到19世纪80年代, 上海的城市景观仍然持续, 甚至复兴了中国城市景观此前已经呈现的跨文化和国际化的元素”^[9]。

如果这种延续和复兴叠加的模式经得起检验, 那么在其他文化领域也应当有所体现。例如文学, 小说就可以立即拿来比较。在19世纪40年代, 扬州产生了第一部惹人议论的“城市小

说”, 题为《风月梦》。帕特里克·哈南(Patrick Hanan)注意到, 这部小说后来被改写成上海小说。原来人物走过的扬州街道被改成了上海街头, 人物被改编为上海人。^[10] 有趣的是, 这部小说密切关注服饰。在19世纪末的上海, 人们自然会期待看到某些西方影响。出人意料的是, 扬州接受该影响还要更早几十年, 至少是因为小说中提到了进口服装面料的使用。

在19世纪末的上海, “时尚”一词可以名副



1. 清, 禹之鼎, 《双英图》, 绢本设色, 56厘米×136厘米,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

其实地应用到服装潮流中。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上海与自称时尚发源地的西方国家大张旗鼓地进行交流,并且很快成为纺织品的主要产地。早在“通商口岸”时代的初期,它的时尚本能就在印刷文化中显而易见,正如吴友如对“时装女士”的描绘所证明的那样。^[11]然而,论及中国此前的历史时期,“什么是时尚”这个恼人问题就立即出现了。如果把时尚看作与工业资本主义相关的美学和实践^[12],那么,不论是否提及上海,谈论早于 19 世纪末的中国服饰显然不合时宜。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历史,虽然同样存在时代错误,但却可以恣意地谈论“时尚”这个词而不受责备。为了解决这个分析的难题,埃夫拉特·齐伦(Efrat Tsëlon)提出了欧洲时尚三步分期法。第一阶段或古典时代的时尚被定格在 14 到 18 世纪之间。在这几个世纪里,贸易扩张和城市精英的崛起对封建秩序构成了挑战。物质文化(包括服装)彰显了这种影响。^[13]巧合的是,中国清朝末年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这个框架内的 16 世纪后期至 19 世纪初期,在服装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基础上,谈论扬州时尚看来是可行的。此外,孟悦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如下观点:这一时期继承了历史的遗产并将其转

化到下一时期,而在后一个时期,上海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国时尚之都。

“时尚”在近代中国的证据是什么?两位中国台湾学者林丽月和巫仁恕的文章指出,明末具有一种充满活力的服饰文化,明末绅士对他们在街头观察到的服饰风格变化的反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4-15]通州地处扬州辖区,当地一份《通州通讯》对时代的变化和反应曾有明确的表述,描写服装风格与时俱进,快速变化,被称为“时样”,亦称为“服妖”。^[16]在长三角的诸多城市中也对服装有过类似的评论。那里的经济作物、家庭手工业和跨区贸易带来了城市的高度繁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帽子在年轻人中成为时尚的焦点。顾起元(1565-1628)在南京曾评论过帽子,从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新月异。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伙,有汉巾、晋巾、唐巾……”^[17]等。由此看来,从 16 世纪末开始,在扬州的帽子店就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头饰。^[18]

本地时尚的痕迹

然而,扬州没有大力参与布料或服装的生产。它的主要商业兴趣在于盐。其富户之最当属盐商。如上所述,他们“挥金如土”。炫富的消费习惯特别不利于养成节俭和勤奋的品质。在 16 世纪末,游客可以在扬州买到国产“平底鞋”,但是“质量低劣”。要买好货,客户要到南京,才可能买到坚固、耐用的鞋。^[19]此时,据明末的地方志记载,“妇人无事居,恒修冶容,斗巧妆,镂金玉为首饰,杂以明珠翠羽,被服绮绣,袒衣皆纯采,其侈丽极矣”^[20]。两个世纪后,扬州鞋业大有改进,扬州本地人林苏门(1748-1809?)盛赞扬州的时尚蝴蝶履超过了苏州和杭州。^[21]但是,纺纱织布的女红传统在扬州本地仍然鲜有体现。通州妇女“织就鸡鸣之布”,苏州妇女受雇于皇家丝绸造办处,“绣成龙裘之衣”。而在扬州,妇女“群与嘻嘻,毫无事”^[22]。

这里的证据出自关于道德的讨论,其讨论的基础是理想的劳动分工——男耕女织。近距离观察,其实扬州女子也要学习“女红”,如果丧偶守寡,也很可能要去纺纱或者织布。当然,后一种情况比较少见。^[23]但是,扬州的家族企业即便在其鼎盛的发展期也鲜有庞大的商业价值。事实上,除了东面的通州和海门,在江北和淮南,通观扬州和淮安辖区,几乎没有纺织工业,也不产棉花或丝绸。在 19 世纪初,当地士大夫阮元的妻子

孔璐华在诗中记载了她在扬州为引进养蚕所做的努力:“江北不养蚕,因从越中取蚕种来扬州,采桑饲之……”^[24]之后的 19 世纪,地方官员仍然抱怨淮安没有丝绸产业,将其归咎于妇女的“懒惰和贪图享乐”。^[25]

江北缺乏纺织工业的后果是活跃了纺织品的进口贸易。无锡、镇江和苏南各地的商人主导了 18 世纪的纺织品贸易。^[26]尽管依赖材料引进,扬州服饰明显具有地方特色。在 1645 年扬州屠城的著名记述中,王秀楚无意中提到了中国人换装文化的一面,他描述了一些“服色皆扬俗”的女性陪伴敌军。^[27]另外一位陪伴士兵的女人,被他认出是“扬人”,显然是依据她的服饰和举止(“鲜衣华饰”)。这番描写表明王秀楚不是本地人。在批评扬州社会的基调中,外人常常会借鉴人的穿衣戴帽而品头论足。在魏禧虔诚的叙述中,记录了扬州寺庙建筑群中平山堂的重建,当地人有极强的获取欲,热衷聚会,喜欢远足,喜欢买唱,追逐歌妓,爱穿漂亮的衣服,喜欢及时享乐,乐于炫富。^[28]

当然,单凭服饰的地方或区域特色不足以成为时尚,也不足以显示豪华,在非时尚的特定服装文化中也存在这两种特征。然而,如前所述,李淦紧随魏禧之后的记录,评论扬州服饰“趋时”,证明了扬州服饰的活力。更晚的一位作家李斗在同一主题上写得更为详细。李斗是当地人,户籍仪征,编写了 18 世纪的《扬州画舫录》。不同于 17 世纪的批评者,他亲切地叙述了扬州这座城市及其风俗,包括衣着和装饰的习惯。他重申了李淦对中国时尚易变性的观察:“扬州服饰总有新样。”虽然就剪裁而言还不清楚其确切的涵义,但他详细介绍了面料,尤其面料色彩方面的细节:

十数年前,缎用八团,后变为大洋莲、拱壁兰。颜色在前尚三蓝、硃、墨、库灰、泥金黄,近于青梁红、樱桃红,谓之福色,以福大将军征台匪时过扬着此色也。^[29]

时装裁缝到缎子街去采购布料,因为方言谐音的缘故,缎子街也叫多子街。^[30]它位于新城的西南,在阙口门和校场的北面,地处扬州繁华的商业中心。购物者主要为男性,除了娼妓、佣人和穷人,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女性是很罕见的。李斗此处所说的时尚可能是指男人的时尚。

在扬州,我们不必走太远的路去邂逅女人的时尚,因为在缎子街附近的翠花街有一家专卖妇女假髻和装饰的店铺。据李斗记述,扬州妇女的发型异于他地。她们密切关注发型的装饰,使用



2. 清,禹之鼎,《乔元之三好图》(局部),纸本设色,107.1 厘米×36.5 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叫作“蝴蝶、望月、花篮、折颈、罗汉髻、懒梳头、双飞燕、到枕松、八面观音”的假髻。她们做头发的风格也是名目繁多，如名为“貂覆额、渔婆勒子”的发式。^[31] 鉴于清初至清朝中期的时尚材料相对匮乏，值得注意的是，再前移一个世纪也可以找到扬州女性发型的参考。1679年，士大夫汪懋麟赋诗一首，诗中透露，清明时节，女人盛装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并提到了女士诱人的新发型^[32]，表明发型在当时乃至其后是时尚的一个重要模式。考虑到明末的帽子信息，发型也指向了头饰的意义，成为特定的时尚代表。可能是在这种相对保守的服装文化中，时尚最容易表现在边缘部分：鞋、帽、配饰。

一方面，当地的风尚最有可能引发观察家的评论；另一方面，可以清楚地发现时尚会在主要的消费中心之间互通有无，毫无疑问，还要从城市过渡到乡村。^[33] 商人的流动性和他们商业兴趣所触及的地理范围必然是促成时尚传播的因素。例如，江南的镇江丝绸商人是扬州纺织品市场的主要供应商。^[34] 镇江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的南岸，是南北货物流通的通道，因此也是文化迁移的交汇点。镇江方言也比苏州、无锡等地的语言更接近扬州方言。有可能由于文化和地理上的接近，镇江是与北方进行贸易的南方商人合乎情理的据点。

时尚交流的另一个明显方式是在不同地方设立小型的商业分支机构。韦明铤对老字号的研究表明，这样的连接方式存在于清代的扬州。扬州有伍少西的一个著名店面，开在埂子街，其招牌是由独立创作的画家杨法（1696-？）制作的。这家企业专门生产销售羊毛袜和毛毡鞋，它本不是扬州的店铺，而是在明末由南京来到此地。^[35] 正如魏禧所言，“扬州的风俗其实是融合了来自全国每一个角落的人”^[36]。戴春林化妆品和香店是扬州另一家更有名的企业，其招牌来自董其昌（1555-1636）的亲笔题写。该店设立多家分店，包括东边的台州店和后来的上海店。^[37] 显然，易君左在来扬州之前就知道这个店，他到达扬州后很快地就到访了该店。^[38]

地方时尚，世界背景

与世界的广泛贸易联系也很重要。明朝时期，蒙古和韩国对流行趋势的影响由北京传播开来。明末，与欧洲的贸易开始显现效果，特别在随身的配饰方面，例如，先是眼镜，然后是手表。从18世纪下半叶起，英国羊毛的进口量越来越大，

中国没有什么货物能满足英商的需求，但是，中国的纺织品贸易市场却让英商垂涎。1755年，有人在广州从一艘英国货轮购买了近5000厄尔（即哗叽的长度）的面料。^[39] 1808年，扬州鞋匠使用英国毛线制作蝴蝶履，林苏门不无自豪地如此描述。^[40] 1816年，途经江西的一个英国访问团断言，他们一定是接近广东了，因为他们开始“看到销售的英国呢绒，偶尔……还有其他欧洲生产的产品”^[41]。无论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勋爵如何强调大清帝国的能力可以满足臣民的所有需求，但很明显，异国情调的货物激发了臣民的兴趣，并被吸收到他们的物质生活中。

长远看来，英国贸易意味着推进中国重大基础设施的改革。临近内陆水道的关键码头，由于重要的贸易活动转移到沿海航线，扬州注定被边缘化。在此之前，它作为中国的内陆城市，在19世纪的商品世界中处于一个非同寻常的优势地位。林苏门的商品目录展示出，19世纪初的扬州是一个充满时尚气息的社会：当地人在盐业贸易的低迷中苦苦挣扎，但他们也在享受新的消费品：餐巾、防风帘、轿子雨盖、手表和钟表，有进口产品，也有当地产品，新宠物包括从广州贩运来的小鸡和小鼠。他们还穿着新式衣服：蜢蚱褂、罗汉搭、西瓜顶子、荷叶领衣、百褶裙，还有随岁月的流逝而袖子越来越宽的外套。鞋类包括蝴蝶履、灌香睡鞋，这可能不是绝对的新设计，但因其设计特点无疑受到市场追捧。^[42]

与西方贸易的增多，以及鸦片战争后进口的增加意味着扬州的西方商品增量。在书上蒙人《风月梦》中的扬州，花花公子和交际名花招摇过市，服饰中多有西方产品：英国的高级呢绒帽，英国的混色印花布旅行箱，英国的印花布制成的餐巾，手表可能是国产的，可能也是进口货。市场上有西方风格的画作出售，甚至西方货币也在此流通。^[43] 《扬州梦》是比上述小说稍晚出版的一本回忆录，旨在记录19世纪40年代的扬州，它也记录了类似的外国进口产品，包括明镜灯、“洋烟”（即鸦片）、钟表、绒、毛皮、羊毛服装。^[44] 关于钟表，作者指出，以前它们的成本相当于聘请私人教师，很阔绰才能负担得起。而现在，“钟表贱而其行也通”。关于羊毛制成的衣服，书中则写道，他喜欢冬季穿羊毛，喜欢它坚挺的感觉。

除了西方特征明显的产品，在服装类的不同产品中一般不容易确定灵感的来源，但是从为数不多的证据中，我们仍然清楚地知道，扬州时装与中国其他城市的发展节奏一起律动。在江南更广

大的地区，正如韦明铤所指出，“扬州风情”与“苏州风情”之争在19世纪早期的上海有据可查。^[45] 这一时期的扬州时尚可以在城市系统的其他地方找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蝴蝶履在杭州、苏州以及扬州都很流行，而从林苏门不得不论及的内容中可以看到，这些鞋的制造商之间也许存在着竞争。宽袖是另一种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被提及。宽袖是明代传承汉代女装的一大风格特色，是区分满、汉族服饰设计的一个考量元素。至少在扬州，昂贵的衣袖有繁多的刺绣，在林苏门所处的时代，袖宽已经从一尺（中国）扩大到一尺半，再放宽，使得衣服繁重得像后来西方时髦女性穿的有衬架的裙子。^[46]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满服饰风格相互影响。汉族的长袄从来没有像满族的长袍那样长，但是它肯定长过腰际，襦似乎已经从18世纪完全废止了。^[47] 相应地，年轻时尚的女性穿的满族长袍开始改为宽袖，与19世纪初的汉族时装潮流相一致，在北京出现时招致了皇帝的愤怒。^[48]

在这一点上，稍稍与埃夫拉特·齐伦所言的欧洲古典时代相比，时尚一词用来不加辨别地指代一个时期内服装风格的品位、趋势和变化。不



3. 清，汪圻，《采荷图》，绢本设色，42厘米×27厘米，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第23期精品拍卖会拍品，2013

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19世纪是一个政治文化转型时期,正确地评价扬州服饰文化需要考虑19世纪与18世纪在这一特定文化领域的时代差异。这些差异,假设存在的话,一定涉及我们如何看待时尚,以及中国如何定义时尚。

其中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文史资料细节的密度。19世纪的资料就服装方面而言,无疑比18世纪的任何类别都更加丰富。事实上,在李斗1795年的《扬州画舫录》之前,对扬州物质文化的专题研究鲜有显著的研究资源,虽然偶尔可以从地方通讯、商业手册和文学作品中挖掘出信息。事实上,就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而论,清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与明末可以相较,两个时期服装评论的丰富程度似乎也不分伯仲。然而,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有关与时俱进的穿戴,即便是零零散散,只言片语,也确实表明,时尚的冲动一直恒定在这漫长时期内的扬州服装文化中。

同时可以察觉到,这一冲动在19世纪得到了加强,主要是由于一系列的著作,诸如林苏门的诗集、邗上蒙人的小说和周生的回忆录,他们不断重复描写各种货物。虽然书面语与词语所指的现象之间有模糊的隔阂,但作家们对商品文化的反应肯定是强化了。当时扬州市场上有更多的商品和更多的种类,对外贸易有助于增大消费的可能性;更丰富的细节已经渗入对衣着表现的评

价中。虽然所有的古典小说都会关注服装特点,详细描述服饰的作品却不多。

周生的《扬州梦》是这些作品中最晚近的一部,因为它记录了在太平天国攻陷长三角之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敲开北方沿海贸易航线之前的旧时代(ancien régime)扬州最后的欢愉,所以该书地位重要。周生是镇江人,一个小文人,已被确认为周伯义(1823-1895)。他通晓天文、地理、军事、武术。^[49]他于1842年,很可能是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抵达扬州。当时大运河被封锁,扬州暂时与南方断绝了交通。在逃避太平天国运动之前,二十多岁的他大部分时间里都住在扬州。他的回忆录既突出了对扬州物质生活的详细描述(如何制作家具,包括如何制作风格比较漂亮的小衣柜,如何选料制作窗帘,如何包饺子,烫酒用什么器皿),又讨论了作者基于人的行为和情感反应安置各种物品的喜好。由于后一特点,这本小书提供了19世纪扬州社会生活和品物相当好的历史记录。

几段引文足以揭示作者对风格、价格和品位的敏感度,主要涉及作者本人和其生活圈中人的衣着等。例如,他认为妇女的服装生而昂贵,一是因为过度点缀,二是因为任何时尚法则的基础因素都倾向于很快过时:

妇人一衣四襖,宽边加芙蓉带、牙、真金

瓣配色,每三四倍正价。又复时时翻新花样,一古遂置问阁,可为暴殄。^[50]

有趣的是,这一评论符合镇江人吝啬的名声,这一点作者在别处也曾提到。然而,对经济的兴趣比对任何品位的兴趣更重要。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要确切地知道如何判断和欣赏面料的质量,这样的鉴赏构成了一个标准,由此可以评估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

清歌一曲获赏无算,衣锦卧绣不知何名目,又不知爱惜,月儿见我湖绸褂谓是川绸,称其朴质。花帐甚工细,与我对谈,以之雪涕。米从袋中出,芙蓉帕积半楼,世上真有其人。^[51]

在另外一处,他记录了自己因为穿戴不当而成为笑柄:

骤晴,不及换钉靴,街上轻薄儿,辄揶揄曰:好大雨,惟水旱靴油底无钉,晴雨咸宜,天阴人多著之。^[52]

尽管这本书提到了许多新奇的服饰,但周生对扬州换装文化的一些说法与我们所了解的一个世纪的城市社会是一致的。例如,李斗评论过,扬州人有在头上戴花的习俗。周生也有阐述:

茉莉夜来香,花极妖媚,美人簪髻或镂银丝为枕囊,花握手中嗅之。卖花翁又用铜丝穿作禽鸟或编花篮,借悬帐中可留二日。^[53]

总结这段描述的时候,周生提及一个花篮的



4. 清,汪圻,《薛宝钗袖笼红麝串》,《红楼梦粉本》,洪振快编:《红楼梦古画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第210页



5. 清,汪圻,《秋爽斋偶结海棠社》,《红楼梦粉本》,洪振快编:《红楼梦古画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第211页



6. 拍照的女性,《新闻画报》插图,清光绪。

价格,这时扬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新元素变得明显突出了——计价的不是铜钱,而是外国硬币。

外币在扬州流通是否意味着社会生活的新节奏?在更小、更优雅的扬州衣柜里装进了新的外国产品是否意味着一个不同的时尚制度在运行?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需要对其他江南城市的服装市场和服装话语进行更多的研究。也许,在时尚界,就像在孟悦所研究的城市室内陈设,19世纪末的上海还在延续甚至在复兴一个在18世纪扬州蓬勃发展的都市文化;但它也可能证明这样的情况,现在看来19世纪像一个过渡期,产生了相当独特的东西,但也许扬州的周生所描述的时尚制度是时代特有的,正如有着独特的兴趣范围和专长领域的作者本人一样。

周生逝于1895年,三年后易君左出生。1936年周生的《扬州梦》由世界书局再版。这可能是由于1934年出版《闲话扬州》引发了关于扬州的宣传热潮。如果是这样的话,易君左就会看到他自己描写扬州的理由,因为周生的《扬州梦》有很大的篇幅伴随着娼妓。然而,这样的阅读只会蓄意忽视二人生活的世界之间的根本差异。细读《扬州梦》,易君左就会发现,他在1932年访问过的偏僻小镇,在几十年前曾经是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的繁华中心。同样在该地,许多商店引领了人们的穿戴时尚,并且从或远或近的海内外其他地方不断进口,不断地更新穿戴的资源。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早在可以同样评说上海之前,扬州已经是一个时尚的城市了。

*本文最初发表于Lucie B. Olivováand Vibeke Børdahl ed. Lifestyle and Entertainment in Yangzhou[M],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9. 本刊经授权刊发。

注释:

- [1] 易君左:《闲话扬州》[M],上海:中华书局,1934,第4-6页。这场争论在此文中已有讨论: Finnane, Antonia. A Place in the Nation: Yangzhou and the Idle Talk Controversy of 1934[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4,53.4:1150-1174.
- [2] 易君左:《闲话扬州》[M],上海:中华书局,1934,第16页。
- [3] Hay, Jonathan.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M].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
- [4] Richard Strassberg. The World of K'ung Shang-Jen: A Man of Letters in Early Ch'ing Chin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144.
- [5] “中华民国”时期的男性服饰见 Harist, Robert E., Jr. Cothes Make the Man: Dress Modernity, and Masculinity in China, ca1912-1937[M]. In Wu Hung and Katherine R. Tsiang, eds.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171-196. 关于旗袍,已有很多研究著作与文章。见 Finnane, Antonia.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History, Nation[M]. London: Hurst, 2007.
- [6] Ho Ping-ti.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54,17: 144.
- [7] 郁达夫:《扬州旧梦寄玉堂》,《人间世》[J],1935年第28期,第3-6页。
- [8] Marmé, Michael. Suzhou: Where the Goods of All the Provinces Converg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9] Meng Yue. Shanghai and the Edges of Empir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 2006: 150.
- [10] Hanan, Patrick. Fengyue Meng and the Courtesan Novel[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98.58.2: 349.
- [11] 例如吴友如在《吴友如画宝》(1983)中描绘的时装女士。
- [12] Entwistle, Joanne. The Fashioned Body: Fashion, Dress,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46-47.
- [13] Efrat Tseñelson. Fashion and the Signification of Social Order[J]. Semiotica 91: 1-14, cited in Entwistle 2000: 44.
- [14] 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新史学》[J],1999年第3期,第111-157页。
- [15] 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新史学》[J],1999年第3期,第55-109页。
- [16] 同[13],第125页。
- [17] 同[14],第68页。
- [18]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
- [19] Ko, Dorothy.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214.
- [20] 《江都县志》[M],济南:齐鲁书社,7.28b-29a。
- [21] 见[清]林苏门:《邗江三百吟》[M],扬州,1808,6.2a; Ko, Dorothy.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215.
- [22] [清]桂超万:《宦游记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5.3a。
- [23] Finnane, Antonia.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London: Ha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24] Wei, Betty Phe-t'i. Ruan Yuan, 1764-1849: The Life and

Work of a Major Scholar-Official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efore the Opium War[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244.

- [25] [清]《光绪淮安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26] 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50页。
- [27] [清]王秀楚:《扬州十日记》[M],《中国近代内乱外祸历史故事丛书(第2卷)》,1964,第230页。
- [28] Owen, Stephen. Salvaging Poetry: The 'Poetic' in the Qing[M]. In Theodore R. Hut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u, eds.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5.
- [29]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M],汪北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194页。
- [30] 同[29]。
- [31] 同[29],第195页。
- [32] Meyer-Fong, Tobie. Making a Place for Meaning in Early Qing Yangzhou[J]. Late Imperial China, 1999,20.1:65.
- [33] 韦明铤:《扬州瘦马》[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第153页。
- [34] 同[29]。
- [35] 韦明铤:《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51-156页。
- [36] 同[28]。
- [37] 同[35],第157-162页。
- [38] 同[2],第14-15页。
- [39] Morse, Hosea Ballou,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M]. Vols 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32.
- [40] [清]林苏门:《邗江三百吟》[M],扬州,1808,6.2a。
- [41] Staunton, George Thomas, Notes of Proceeding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M]. London: Havant Press, 1824:360.
- [42] 见[清]林苏门:《邗江三百吟》[M],扬州,1808,这一问题在此文中已有讨论: Finnane, Antonia. Yangzhou's 'Modernity': Fashion and Consuption in the Early-Nineteenth-Century World[J].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2003, 11.2:395-425.
- [43] [清]邗上蒙人:《风月梦》[M],《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0、14、28、30、37、54页。
- [44] [清]焦东周生:《扬州梦》[M],台北:世界书局,1978,第45页。
- [45],同[33]。
- [46],同[40],6.4b.49-50。
- [47] Finnane, Antonia.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History, Nation. London: Hurst, 2007: 49-50.
- [48] Rawski, Evelyn.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41.
- [49] 吴春彦、陆林:《“焦东周生”即丹徒周伯义:清代文言小说扬州梦作者考》[J],《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71卷第1期,第84-94页。
- [50] 同[44],第44页。
- [51] 同[44]。
- [52] 同[44]。
- [53] 同[44],第53页。

[澳] 安东篱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王春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

穆凤良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